



# 中国近代 经学史

田 汉 云 著  
TIAN HAN YUN ZHU

三 秦 出 版 社  
SAN QIN CHU BAN SHE

责任编辑/赵建黎

封面设计/陈 飞

---

ZERENBIANJIZHAOJIANLIFENGMIANSHIJIHENFEI

ISBN7-80628-062-6/k · 22

ISBN 7-80628-062-6



9 787806 280621 >

定价:28.00 元

# 中国近代 经学史

TIAN HAN YUN ZHU

田汉云 著

三秦出版社

SAN QIN CHU BAN SHE

## 中国近代经学史

---

田汉云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05千字

版 次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062-6/K·22

定 价 28.00元

---

## 目 录

<b>第一章 引论</b> .....	(1)
第一节 近代经学与社会政治.....	(2)
第二节 近代经学与教育改革.....	(7)
第三节 近代经学与铨选制度 .....	(20)
第四节 近代经学与古代经学 .....	(25)
第五节 近代经学与西学东渐 .....	(31)
<b>第二章 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b> .....	(42)
第一节 方东树对乾嘉汉学的批判 .....	(43)
第二节 刘逢禄的《公羊》学新解 .....	(54)
第三节 宋翔凤的《论语》学发微 .....	(63)
第四节 魏源：以经术为治术 .....	(72)
第五节 龚自珍：通古近 定生民 .....	(89)
第六节 汪喜孙：学古之道 藏器于身.....	(100)
<b>第三章 乾嘉朴学的延续与总结</b> .....	(111)
第一节 朱骏声与《六十四卦经解》.....	(112)
第二节 胡培翬与《仪礼正义》.....	(119)
第三节 马瑞辰与《毛诗传笺通释》.....	(127)
第四节 陈奂与《诗毛氏传疏》.....	(137)

第五节	刘文淇的《左传》研究	(146)
第六节	刘宝楠与《论语正义》	(153)
第七节	陈立与《公羊义疏》	(162)
第八节	柳兴恩与《谷梁大义述》	(169)
<b>第四章</b>	<b>汉学与宋学的合流</b>	<b>(179)</b>
第一节	曾国藩：“汉宋兼容”的倡导者	(180)
第二节	黄以周：以礼学为理学	(193)
第三节	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204)
第四节	郭嵩焘与《礼记质疑》	(213)
第五节	郑珍的礼学：崇尚郑学会通郑朱	(222)
第六节	丁寿昌与《读易会通》	(232)
第七节	钟文烝与《谷梁补注》	(240)
第八节	陈澧与《东塾读书记》	(251)
<b>第五章</b>	<b>考据与经世的贯通</b>	<b>(260)</b>
第一节	丁晏：吴派经学的后劲	(260)
第二节	邹汉勋与《读书偶识》	(271)
第三节	陈乔枞与《诗》、《书》今文遗说考	(279)
第四节	戴望与《论语注》	(287)
第五节	刘恭冕的《论语》何注研究	(296)
第六节	方玉润与《诗经原始》	(300)
第七节	俞樾：咸同时期的朴学大师	(317)
第八节	王闿运：兼综经今古文学	(330)
<b>第六章</b>	<b>今文经学的正宗与别流</b>	<b>(338)</b>
第一节	王先谦：尊今抑古的《诗》《书》考证	(339)
第二节	皮锡瑞：正统今文学的殿军	(348)
第三节	廖平：经学的泛衍与畸变	(365)

第四节	康有为：大道复昌 其责在我·····	(378)
第五节	梁启超：从论政到问学的迁移·····	(399)
<b>第七章</b>	<b>古文经学的改造与复兴·····</b>	<b>(411)</b>
第一节	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412)
第二节	章炳麟：经学近代化的代表·····	(425)
第三节	刘师培：朴学的继承与超越·····	(449)
第四节	王国维的考证学：宗旧方法而用新资料···	(471)
<b>第八章</b>	<b>体用之辨与儒学的衰落·····</b>	<b>(482)</b>
第一节	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483)
第二节	严复：儒学、西学优劣论·····	(492)
第三节	谭嗣同：“仁学”与儒学·····	(500)
第四节	唐才常：尊新即所以复古·····	(511)
第五节	何启与胡礼垣：图新者必舍旧·····	(521)
第六节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儒学·····	(530)
第七节	陈独秀：批判改良主义儒学观·····	(539)
第八节	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548)
<b>结 语</b>	·····	<b>(558)</b>

## 第 一 章

## 引 论

所谓近代经学，特指 1820 年至 1920 年之间对儒家经典及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活动。从 1820 到 1920 这 100 年的经学研究不是孤立的文化存在，而是整个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时代的学者认为，经学是经纬万端的大学问，这当然是对儒学的过分褒扬。不过，应当承认，儒学自其开宗立派之时起，确实具有中国早期文化的混沌性，或者说学术内涵上广泛的包容性。这一特点使它得以在宽广的领域内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反过来说，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也制约和干预了儒者对经典的诠释发挥。因此，当我们考察经学历史时，就有必要联系到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就近代经学研究而言，作为社会背景的主要有社会政治的变动、文化教育的改革、铨选制度的改良、古代经学的影响、西方文化的输入。不考察这些方面的历史背景，便不能说明近代经学学术走势的动因和学术风貌的成因。在近代经学的诸种背景中，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是社会政治的变动。社会政治是纲，其余方面是目。统治者进行的文教体制与选举制度的改革，文化界古代经学、西方文化的传播，都是与社会政治的变动密不可分的。所以，社会背景的不同方面大体上是形成合力而作用于经学研究的。



## 第一节 近代经学与社会政治

经学是政治性很强的一门学术。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决定的。章学诚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句话不无可议之处，但是认为儒家经典的思想理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则完全符合实际。因此，经学自古以来便或隐或显地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

近代经学与以往历代及清代中、前期经学相比较，时间跨度不是很长，但是百余年间学术思潮多次发生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的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政治的剧烈震荡。

嘉庆年间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清朝的衰落突出地表现为统治阶级日益加深的腐败。1799年，嘉庆皇帝在亲政之始即着手惩治不法官吏。大学士和珅被革职赐死，抄没家产。时人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令人想见和珅家财之多。嘉庆皇帝在上谕中痛斥许多武臣“冒功升赏”、“营私肥橐”；又在一份奏折批语中切责统兵者“皆踵福康安、和琳习气，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因“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明令禁止京城内开设戏园。鉴于地方官府享乐之风盛炽，又不许督抚司道官署内自养戏班。清朝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折射出吏治腐败的严重性。

财政经济方面也是百孔千疮。1809年，核出安徽一省历年亏空银180余万两。1812年各省钱粮积欠达1900万两之多。1815年，山东一省积欠钱粮竟至600万两。严重的财政危机实与大小官吏贪财枉法相关。1809年查办仓场舞弊案，核定吏员上下串通窃米数十万石。另又发现工部书吏私刻印章，冒领库

款 14 次。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总是以敲榨民众为条件的。因此，吏治的腐败必然激起民众的仇视和反抗。嘉庆皇帝在位 25 年，无一年太平。川、陕、湘、鄂、豫、鲁、浙、粤诸省都是暴动多发地区。1813 年，天理教徒林清在京城率众进攻皇宫，令朝廷大为恐慌。19 世纪之初的清王朝，内忧未已，外患又至。英国侵略者以武力支持罪恶的鸦片贸易，毒害中国民众，掠夺中国资财。从 1806 年到 1809 年，所谓“海漏”有 2000 万两白银，足见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已构成一种民族危机。

如果说在这种形势下当政者重视的是采取行政性措施，思想家们考虑的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策。道光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虽有多种原因，阴霾笼罩的政治形势起着有力的触发作用。

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以考释群书、整理古籍为风尚。试看阮元编选的《皇清经解》，其中大量著作很难看出与当世社会政治有密切联系。但是最先要求以经学经世的，恰恰是由乾嘉而入道光朝的部分学术名家。段玉裁认为当前士林之“大病”是“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转引自陈寿祺《左海文集》卷 7《孟子八录跋》）阮元也认为：“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出处同上）阮元甚至以绝对化的口吻说：“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研经室集》一集《孟子论仁论》）张惠言、恽敬则以“出其言，则思实其行；思其行，则务固其志”相勉励。（张惠言《茗柯文编·送恽子居序》）这些意见的实质，都是主张以改造学风来改良士风。与改变学风的强烈要求相适应，嘉庆、道光之交部分学人的治经实践中已经展露出经学思潮转变的端倪。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读经应以“六经”为主，至于《论语》、《孟子》、《孝经》、《礼记》、《春秋》三传，只是“先圣之微言与

群经之羽翼”。读经的目的主要在于“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治经而忘却论政，是不足取的。阮元在《曾子十篇注释序》中说：“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渐远，其言亦渐异。”（《研经室集》一集）因此，他诠释经典，特重“古义”的研寻。

嘉、道之交，阮、章、段、张等老一辈学者的主张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但是他们以经学经世的治学实绩却不突出，因而当后人谈论晚清经世思潮时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作用。真正把治经与经世结合起来开展经学研究的，主要是常州今文学派。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称述今文经以切时政，标志着经学思潮由考据之学向经世之学的根本转变。在他们的学术论著里，可以看到有关改革时弊的种种设想和要求。不过，顺应经世思潮的并不只是常州今文经师，许多宋学家和汉学考据家也同样拥护和顺应这一潮流。宋学家的作用主要是批判正统的考据派，为经世思潮的崛起扫清道路。而汉学家虽然在治学上无大变化，却很讲究“修身立行”。

1850年，洪秀全发动了农民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三年内便攻占南方各省，并建国号、立都城，公然与清朝政府分庭抗礼。太平军起义与历史上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相比有一重要特点，即具有较为系统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与西方基督教关系至密，拜上帝教的教义是其主体形态。它在哲学上、政治上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尖锐对立，因而被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目为“邪教”。太平军早期在军事战线上节节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战战兢兢，大有风雨飘摇之感。这场战争使清朝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全面暴露，论其深刻程度实为当时任何文章的指陈所不可及。为了同太平天国相对抗，统治阶级在振军经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整饬风俗人心。

整饬风俗人心，目的是同太平天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在地主阶级看来，同太平天国的斗争，军事战线固然是残酷无情的，文化战线实际上亦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而且，不抓文化战线的斗争，便不能与太平天国相抗衡。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里强调的是上帝教与孔孟之道的对立、太平军起义对儒家道统的威胁。这道檄文在广大封建士大夫中受到普遍的赞誉，反映出曾氏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强烈共鸣。鉴于广大民众乐于顺附与加入太平军，而清朝的文臣武将表现出的畏缩与懦弱，咸丰皇帝痛感封建伦常崩坏不振，遂专门颁布谕旨，要求士人重视《孝经》的研习。在这种形势下，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都迅速缓和了，代之而起的是汉宋兼采、古今兼容的学术倾向。咸丰年间的经学家或遍习群经，或专治一经，但是在理论上专主一派一家者不多见，这是近代史上唯一而短暂的经学统一时期。此时经师持论多较为圆通。朱一新说：“近世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转引自《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陈澧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学也，今专以德行为学，误矣。……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为学，而以己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东塾读书记·论语》）此二人之论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1856年至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举国上下的震

动是空前的。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帝仓皇出逃，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惨遭焚掠，《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无一不是大屈辱、大灾难。为了安内攘外，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和科技，改良政治与文化，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当年魏源要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遭许多守旧者的讥议。此时以“西艺”求富强已成为不争之论，以练兵、制械、造船、电讯、矿务、织造技术为发展重点的洋务运动进入高潮。但是在要不要学习“西政”的问题上，思想文化界存在尖锐分歧，这场论争从同治年间延续到光绪年间。有人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莫能及也。”（《邵氏危言·译书》）光绪十五年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在奏折中转述丁立钧的话，称：“近年以来，正学不明，人心思动。读书通籍之士，以立品为迂谈，以放言为晓事，以圣贤书为无用，以礼教事为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法为万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为奉行故事。”对要求改革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人们持敌视态度。但是随着西方人文思想日益广泛地输入，也有许多学者要求吸纳它，借以补充、改造儒家学说。产生于同、光之际的经学论著，或以中学与西学相比附，或对两者进行比较而论其优劣，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体西用”说。

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升级。英国居然成立所谓“瓜分中国和平会”，德皇猖狂叫嚣要“逐渐瓜分大清帝国”。当亡国惨祸迫近的时刻，爱国士大夫发起了维新运动。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1300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变法。维新运动对经学研究影响极大。维新运动的理论家们以前无古人的政治勇气，公开要求全面地整合中西文化，试图以儒学与西学相嫁接，找出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19世纪末的经学研究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形态上是

新一轮的今古文之争。康有为等今文经师主张扬弃儒学的某些方面，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提出系统的治国理论以挽救垂死的清王朝。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派经师则引西学而释故典，称经义而论革命，要求推翻清朝而令中国获得新生。无论从哪一派的学术论著看，儒学所受到的冲击都是空前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丧失，至此已成定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传统儒学从此丧失了它的政治后盾。但是真正宣告旧儒学终结的，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后的传统儒学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儒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仍然是堂而皇之的大宗，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依然是广泛的。所以当袁世凯妄图恢复封建帝制时，有可能借用儒学作为精神支柱。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在武装讨袁的同时，开展了更为深刻有力的文化战线的斗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展开决绝的批判，从此，旧儒学便一蹶不振了。

## 第二节 近代经学与教育改革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以儒学作为主要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因此，在文化教育领域，它一以贯之地奉行尊崇儒学的政策。这样，教育领域成为儒学传播的主要渠道，这里既是经学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又是哺育儒者的摇篮。

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逐步发生了变化。晚清时期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环节。其中心课题是调整“道”与“艺”的关系。由此而引发的教学内容、教育体制的变化，结果总是削弱儒学的地位，缩小儒学传播的地盘，打乱经师培养的机制。教育改革是古代经学走向衰落的重要直接原因。

## 一、教育体制：学堂取代书院

清代教育体制的框架结构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为主体，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学是官学的必要补充。其办学形式有书院、义学、社学、私塾等。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基本上无专业分工。各层次官学皆称“儒学”，是很可说明问题的。国子监生分居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大体上只有修习重点的差异，而终究不越儒学的范围。至于国子监之外设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因规模甚小，在教育领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9世纪中期，由于对外交往增多，更由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震撼，清朝统治者被迫重视实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教育，传承已久的教育制度发生动摇。

在清朝政府采取教育改革的实际措施之前，西方列强已经用强制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教育成分。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明文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华建造礼拜堂、学堂，地方官府必须予以保护。其后，资本主义列强所办的教会学校日益增多。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清朝政府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学务杂志》第6期载：“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这真是消极抵抗主义的自供状。资本主义列强广设教会学校，试图用基督教教义加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同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竞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尽管教会学校兴办者其心可诛，其办学模式却成为清朝教育改革的重要参照物。终晚清之世，“新教育”的

基本思路大体不出儒学加实学的格局。

尽管如此，列强在华办学终究算不上教育体制的改革。最初改变旧教育体制的举措是兴办洋务学堂。1862年，清政府为着办理外交事务的需要，开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名曰京师同文馆。其后以培训译员为任务的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相继成立。为了改革军事，军事学校也陆续创建。1866年，福州成立船政学堂；1891年，天津办起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之后10年之内，每过两年即创设一所军事学校。此外，专门的技术学堂也纷纷诞生。洋务学堂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在教育领域称得上异军突起。虽然官私儒学依然存在，整个办学体制毕竟发生了变化。

当然，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官私儒学占优势，洋务学堂实际上只是它的补充。这两条腿一粗一细相距悬远，不足支撑清王朝的衰病之躯走出困境，更深刻的改革在酝酿之中。

早在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首次派赴欧洲访问的官员斌椿就注意到西方的教育体制与中国大不同。他在《乘槎笔记》“职方外记”条略述其大概。黄遵宪在日本亦留心其教育体制，并指出：“盖教法皆得之泰西”，“泰西学校之盛”与人材之众是相为表里的。1882年（光绪八年）王之春明确主张在中国应推广学校制，他认为：西方各国学校“规例极为详备”，对于培育人材而言，“诚法之至善者也”。（《蠡测危言》第十三篇）1891年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指出：“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892年（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学校》篇中，参较中西教育体制之异同，指出：中国“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本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而后世，“学校之制废”，遂令人材匮乏。泰西各国之办学，“实



窃我中国古圣人之绪余”。师其学制，“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是势所必然。如果以之“诋为异学，甘守固陋”，是“泥古不化”，“未之思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指出，仅仅是以洋务学堂作为旧体制的补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所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臣，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接受之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推广学校的要求。

如果说郑观应等人的意见还只是议于野，1896年之后，则不断地有人奏于朝。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芬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选派游历，使之与学校“相须而成”，此折6月12日上，同日即诏总理衙门议复。其结果大体准行。该衙门所上奏折云：“臣衙门于去年十二月议复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奏内，请旨飭下沿江沿海将军督抚，于已设学堂者量为拓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听令官绅集资奏明办理，亦即该侍郎所谓推广学校、奖励人才而资御侮之意，业经奉旨通行各省遵办在案。”并且明确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均可于所立学堂中兼举并行”。其后，康有为于1898年7月3日奏请改书院、淫祠为学堂。同年7月4日，贵州巡抚王毓藻亦请改设学堂，以广作育。同年7月10日，光绪帝下令，限两月内“将各省府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并且令各地义学、社学“一律中西兼习”。民